

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测度及影响因素

——兼与城镇流动人口的比较

王 震*

内容提要 本文在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基础上，使用模糊集方法构造了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指标，并通过与城镇流动人口的比较，给出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基本判断，并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因素。结果显示，低端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显著低于城镇流动人口，而高端农民工则显著高于城镇流动人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显著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已婚、教育程度较高，拥有现代型社会资本的农民工城市融入度更高。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显著正向效应。省级大城市和县级小城市农民工的融入度显著高于地级中等城市的农民工。

关键词 农民工 城镇流动人口 城市社会融入

一 引言

有序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中国政府提出的重大战略。但囿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大量农村迁移人口（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就业和生活，却没有完成市民化，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导致中国的城镇化表现为“半城镇化”、“虚城镇化”的状态（王春光，2006；辜胜阻等，2006；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而促进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环节。近年来对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研究成为

* 王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电子邮箱：wangzhen09@126.com。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与途径”（11CJL032）成果之一。作者感谢朱玲研究员、魏众研究员、朱恒鹏研究员、邓曲恒博士、姚宇博士、金成武博士、何伟博士的评论与建议。

一个热点。

关于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定义以及测度，并以此为基础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进行判断。例如杨菊华（2009）认为，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至少包含四个维度：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身份认同。悦中山等（2011）和悦中山等（2012）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定义为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之间差异的消解，并从三个维度构造了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测度指标：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心理融合。

二是对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因素的实证分析。这些研究在微观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建立各种模型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行了回归分析。例如何军（2011）和何军（2012）使用江苏省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教育水平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更大，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更大。李培林和田丰（2012）根据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对老一代农民工和新一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差异进行了研究，发现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没有根本差异；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认同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

这些研究为认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以及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诸因素提供了基础。但是，这些研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对于如何定义和测度农民工城市融入存在较大分歧。一些研究仅使用主观的心理认同刻画城市融入，一些研究还混淆了城市融入本身和影响城市融入的因素。其次，缺乏与其他流动人口群体的比较，从而无法给出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的基本判断。实际上，中国存在两种类型的流动人口：一是农村流动人口，即农民工；二是城镇流动人口。城镇流动人口与农民工的主要区别在于其具有城镇户籍；但是与农民工一样，他们也属于流动人口。因此，通过与城镇流动人口在所居城市的融入程度的比较，既可以给出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一个判断，又可以发现影响二者城市融入的不同原因，特别是发现户籍对流动人口在所居城市的融入的影响。最后，已有研究使用的数据基本都是局限于一个省份或一个城市的调查，影响其分析结果的代表性。

基于此，本文在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生委”）2010年下半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基础上，首先给出一个社会融入的新的测度方法，进而通过与城镇流动人口的比较，分析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状况，并对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因素进行分析。本文将农民工城市融入界定为客观的社区活动参与和

主观心理认同两个维度，并借用模糊集方法（Fuzzy Set Analysis）构造了综合性的城市融入指标。

二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定义与测度

社会融入（或融合）（Social Integration）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的概念，至今尚未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悦中山等，2011）。Gordon（1964）将融合^①定义为个体与群体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并将其作为一个包含文化的、结构的以及婚姻的多维度的过程。在对国际移民的研究中，Alba & Nee（1997）将融合定义为外来移民与本国居民之间随时间而发生的在种族、文化以及社会方面的差异的消失，即外来移民与本国居民之间的趋同。Bollen & Hoyle（1990）则从主观感知方面对社会融合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融合的心理认同包括两个维度：即对群体的从属感以及对群体的主观价值判断。

在公共政策领域，社会融合近年来也成为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关注的焦点。UNRISD（1994）将社会融合定义为一个正向的社会目标，其含义是所有人能够获得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加拿大政府将社会融合定义为包含共同价值、共同使命和共同机会的社区发展过程，其基础是所有居民的信任、希望与互助，并将社会融合具体化为如下目标：归属、包容、参与、认同以及合法性（Berger-Schmitt，2000）。新西兰政府也将社会融合作为政府的重要目标，并制定了详细的社会融合的指标，包括归属、参与、包容、认同以及合法性（Spoonley & Peace，2005）。

国外对社会融入的关注主要是国际移民融入住在国社会，其主要障碍是种族的、语言的和文化的。这一点与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入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有很大差异：对于农民工而言，融入城市的主要障碍并不是种族的，也极少是语言的和文化的，更多的是来自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性障碍（杨菊华，2009）。在已有研究中，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测度，也使用了多种指标，这些指标有单一性的指标，例如使用对所居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蔡禾、曹志刚，2009；童雪敏等，2012），也有多维度的指标，例如将农民工城市融入区分为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悦中山等，2012），或区分为行为方式融入、价值观念融入和对城市的归属感（何军，2012）。单一指标忽视了社会融入的多维性，而使用多维指标则没有给出一个综合性的城市融

^① 作者使用“同化（Assimilation）”一词来指称“融合”，这也是社会融合理论纷繁复杂之处。除了 Integration、Assimilation 之外，Social cohesion 也被经常用到。

入状况的判断。

基于已有研究,本文将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界定为两个层次:一是客观行为意义上的社区参与,二是主观感知意义上的心理认同。社区活动的参与从行为上测度了农民工对所居住社区的融入。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越高,则农民工对所居住社区的融入程度越高。对所居住城市的心理认同则表达了农民工对所居住城市的归属感和价值判断(Bollen & Hoyle, 1990)。这一界定容纳了社会融合的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较为完整地测度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

根据这一定义,我们使用国家计生委2010年下半年农民工监测数据(B卷)来对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进行分析。这一监测在全国6个城市进行,具有较好的代表性^①,且该数据还包含了城镇流动人口的数据,可以用来进行比较分析。数据共有流动人口样本8200个,其中农民工7051人,城镇流动人口1149人。

在数据中,社区参与通过6个方面社区活动的参与表示:是否参加社区文体活动、是否参加社区公益活动、是否参加社区计划生育协会的活动^②、是否参加社区选举、是否参加听证会,以及是否参加有助于培养子女的活动。农民工对所居住城市的心理认同通过如下6个问题表达:一是我喜欢我现在居住的城市,二是关注现在居住城市的变化,三是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他们的一员,四是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五是我觉得本地人总是看不起外地人,六是无论挣多少钱也不可能成为本地人中的一员。对这六个问题的回答使用4级量表: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同意、完全同意。

表1和表2给出了农民工与城镇流动人口在社区参与和心理认同方面的比较。在社区活动的参与上,农民工参与比例高于城镇流动人口的一是社区文体活动,二是计划生育协会活动;而在社会公益活动、社区选举和听证会参与上,城镇流动人口参加的比例都显著高于农民工。在心理认同方面,农民工和城镇流动人口在关注所居城市变化、愿意融入本地和觉得本地人愿意外地人融入这三个方面,城镇流动人口回答同意的比例高于农民工。

^① 数据的详细介绍见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1)。

^② 计划生育协会属于非营利性群众组织。在《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章程》中,计划生育协会的任务设定为5条,主要是宣传普及、提供计划生育技术支持等。在实际运行中,计划生育协会实际上充当了计划生育部门在服务性事务上的执行人,例如避孕用具的发放、流动人口孕产妇服务等。参与计划生育协会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民工被纳入了当地政府计划生育服务的覆盖下,也表达了对当地社会的一种融入。

表 1 农民工与城镇流动人口社区参与情况

	农民工(%)	城镇流动人口(%)	F 检验 p 值
社区文体活动	19.32	17.15	0.0820
社会公益活动(如献血、募捐、做义工等)	31.83	44.73	0.0000
计划生育协会活动	23.36	18.62	0.0004
社区选举	1.83	4.35	0.0000
听证会	1.42	2.52	0.0052
有助于培养/教育子女的活动	17.97	18.02	0.9696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计生委 2010 年下半年农民工监测数据（B 卷）计算得到。

表 2 农民工与城镇流动人口对所居城市心理认同情况

单位：%

		农民工	城镇流动人口			农民工	城镇流动人口
喜欢所居城市 p=0.1268	1	0.65	1.13	觉得本地人愿意 接受 p=0.0694	1	1.45	1.74
	2	4.10	5.13		2	18.52	14.71
	3	83.49	82.07		3	72.71	76.33
	4	11.76	11.66		4	7.32	7.22
关注所居城市 变化 p=0.0023	1	0.74	1.04	本地人总是看不 起外地人 p=0.1165	1	8.41	7.31
	2	7.08	3.92		2	66.73	67.97
	3	81.27	82.25		3	22.99	20.80
	4	10.92	12.79		4	1.87	3.92
愿意融入本地 p=0.0029	1	0.82	0.70	无论挣多少钱也 不能成为本地人 p=0.1487	1	9.22	10.36
	2	9.13	6.44		2	62.22	63.45
	3	79.12	80.33		3	26.38	23.41
	4	10.92	12.53		4	2.18	2.79

注：表中 1、2、3、4 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同意”、“完全同意”四个选项；p 值为 F 检验的 p 值。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计生委 2010 年下半年农民工监测数据（B 卷）计算得到。

多维度指标无法给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综合判断，因此需要设计单一的综合指标。综合性指标的设计，一种方法是使用因子分析，寻找公共因子，通过方差贡献率加权，得到综合指标。因子分析对不同因子的加权根据的是方差贡献率，即方差贡献率大的加权越高。但在农民工城市融入指标的设计上，这一点并不适合。例如在社区参与中，参加社区选举和听证会的比例最小。在因子分析中，这两个维度的权重很可能非常小。但是，注意到能够参加社区选举和听证会，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含义更加

重要，因为这两项活动是被社区认可、进入社区生活主流的核心指标，因此，我们需要的指标构建方式应能满足根据指标自身重要性进行加权的特点。

据此，本文借鉴使用模糊集理论 (Fuzzy Set Theory) (Zadeh, 1965) 来设计农民工社区参与及心理认同、社会融合的综合性指标。该指标设计的方法已经广泛应用在贫困指标设计以及社会福利指标的设计中 (Cerioli & Zani, 1990; Cheli & Lemmi, 1995; Cheli, 1995; Lelli, 2001)。模糊集理论通过隶属度函数 (Membership function) 为不同备选项赋值。个体在现实中遇到模糊选项时，模糊集理论能够提供反映个体直觉和思维过程的模型，从而通过隶属度函数得到的隶属度就能表示个体的选择倾向 (Dubois & Prade, 1980)。

在加权方式上，我们使用平均值方法加权。该方法使用基于实际数据获得的各个子指标的权重进行加权，避免了其他加总方式经常涉及的主观性。同时，这一加权方式将隶属度较高的子指标赋予较低的权重，隶属度较低子指标赋予较高的权重。这一指标的现实意义在于那些更加难以实现的指标 (例如参加社区选举和听证会)，其权重较高。

社区参与是一个“0 和 1”的二分变量，心理认同则是 4 选项的等距变量。根据 Cerioli & Zani (1990)、Miceli (1998) 以及 Lelli (2001)，二分变量和等距变量的隶属度函数分别设定如下：

$$\mu(x_i^j) = \begin{cases} 0, & x_i^j = 0 \\ 1, & x_i^j = 1 \end{cases} \quad (1)$$

$$\mu(x_i^j) = \begin{cases} 0, & x_i^j = \min(x_i^j) \\ \frac{x_i^j - \min(x_i^j)}{\max(x_i^j) - \min(x_i^j)}, & \min(x_i^j) < x_i^j < \max(x_i^j) \\ 1, & x_i^j = \max(x_i^j) \end{cases} \quad (2)$$

其中 $\mu(\cdot)$ 为隶属度函数， x_i^j ($j=1, \dots, k; i=1, \dots, n$) 为第 i 个样本的第 j 个子指标的原始值。(1) 式给出了“0 和 1”二分变量的隶属度函数，(2) 式给出了等距变量的隶属度函数。由于 (1) 式中的二分变量是确定集，因此隶属度函数没有改变原始值。在 (2) 式中 x_i^j 的最小值设定为 0，最大值设定为 1，中间的值则给予标准化处理。

通过隶属度函数得到每一个样本子指标的隶属度后，需要通过加总得到综合性的指标。加总过程实际上是寻找合适的函数 $h(\cdot)$ ，获得综合指标 $\mu_u(i)$ ：

$$\mu_u(i) = h(\mu_1(i), \dots, \mu_j(i)) \quad (3)$$

其中 $\mu_u(i)$ 为综合性指标, $\mu_j(i)$ 为第 i 个样本的第 j 个子指标。加总函数 $h(\cdot)$ 有多种形式 (Lelli, 2001), 在本文中我们使用加权算术平均的方法:

$$\mu_u(i) = \sum_{j=1}^J \omega_j \mu_j(i) \quad (4)$$

其中的权重 ω_j 设定如下:

$$\omega_j = \frac{\ln(1/\overline{\mu_j(i)})}{\sum_{j=1}^J \ln(1/\overline{\mu_j(i)})} \quad (5)$$

其中 $\overline{\mu_j(i)} = \frac{1}{n} \sum_{i=1}^n \mu_j(i)$, 为第 j 个子指标的平均值。

根据上述方法我们得到了农民工与城镇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度、心理认同度以及城市融入度, 其相关统计结果见表 3 及图 1。在社区参与度方面, 农民工的均值为 0.1030, 低于城镇流动人口, 且差异是显著的。而在心理认同方面, 农民工和城镇流动人口则没有显著差异。综合了社区参与和心理认同后的城市融入指标则显示,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显著低于城镇流动人口。

表 3 农民工与城镇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度情况及比较

	社区参与度		心理认同度		城市融入度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农民工	0.1030	0.1413	0.6370	0.1149	0.1875	0.1242	7051
城镇流动人口	0.1184	0.1696	0.6418	0.1146	0.2076	0.1450	1149
全部	0.1051	0.1457	0.6377	0.1149	0.1903	0.1275	8200
F 检验 p 值	0.0008		0.1887		0.0000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计生委 2010 年下半年农民工监测数据 (B 卷) 计算得到。

三 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因素: 估计方法及变量描述

本节使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影响农民工和城镇流动人口城市社会融入度的因素。我们对如下方程进行回归:

$$y_i = \beta x_i + \varepsilon_i, \quad i = 1, \dots, n \quad (6)$$

其中 y_i 因变量为农民工和城镇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度; x_i 为自变量向量; β 为待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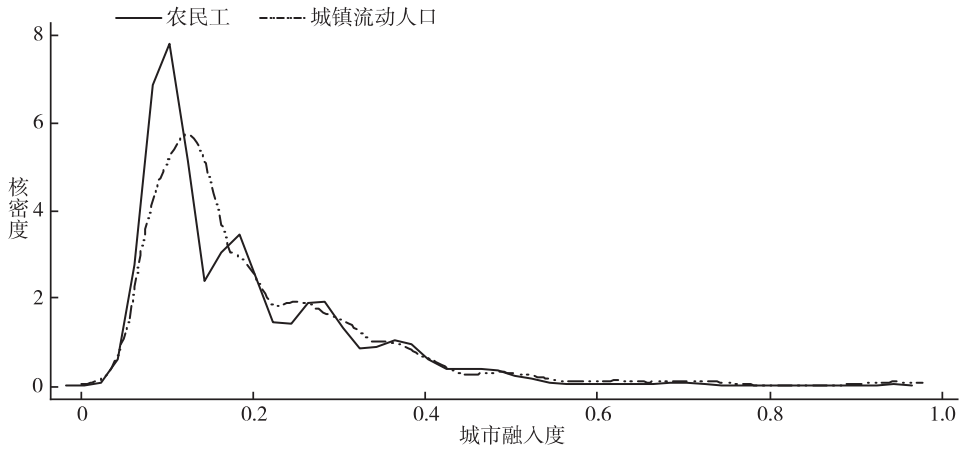


图1 农民工与城镇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度的核密度估计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计生委2010年下半年农民工监测数据（B卷）计算得到。

计的参数； ε_i 为误差项。对（6）进行估计使用的方法一般为最小二乘法（OLS）回归。OLS 回归是在均值意义上的回归。但是，实际上在城市融入度的不同分位点上，自变量对城市融入度的影响是有差别的，均值回归忽视了这种差别。为了发现在城市融入度的不同分位点上自变量的不同效应，此处我们使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在不同分位点上对（6）式进行估计。分位数回归模型可设定如下（Koenker & Bassett, 1978；Koenker & Hallock, 2001）：

$$y_i = \beta_{\theta_i} x_i + \varepsilon_{\theta_i}, \theta \in (0,1), i = 1,2,\dots,n \quad (7)$$

其中 θ 为分位数， β_{θ_i} 为第 θ 分位点的回归系数， y_i 和 x_i 分别为因变量和自变量向量。分位数回归的系数通过最小化残差的加权和获得：

$$\hat{\beta}_{\theta} = \text{Min} \left[\sum_i \rho_{\theta} * (y_i - \beta_{\theta_i} x_i) \right], i = 1,2,\dots,n \quad (8)$$

其中 ρ_{θ} 为检查函数， $\rho_{\theta} = \begin{cases} \theta * \varepsilon_i; & \varepsilon_i \geq 0 \\ (\theta - 1) * \varepsilon_i; & \varepsilon_i \leq 0. \end{cases}$

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上，我们还想知道的一个问题是，户籍性质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有何影响？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将农民工和城镇流动人口的数据合并在一起，并在自变量中加入户籍一项，来估计在控制其他条件下户籍制度对城市融入度的影响。在回归中使用的自变量包括在表4中。

表 4 农民工、城镇流动人口及全部流动人口自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城镇流动人口	农民工	全部样本	变量	城镇流动人口	农民工	全部样本
男性(%)	43.69	47.47	46.94	家庭结构(%)			
新生代(%)	47.69	45.07	45.44	未婚单身	30.64	23.19	24.23
教育程度(%)				已婚单身	15.23	14.68	14.76
小学及以下	3.31	14	12	已婚与配偶共同居住	54.13	62.13	61.01
初中	22.72	58	53	职业发展目标(%)			
高中/中专	31.59	23.29	24.45	无明确目标	47.61	54.45	53.49
大专及以上学历	42.38	4.96	10.21	成为业务骨干	9.4	3.25	4.11
社会资本(%)				成为管理人员	13.05	6.48	7.4
个体型	48.55	43.82	44.47	获取较高收入	21.76	29.03	28.01
关系型	36.94	49.96	48.19	工作稳定轻松	8.18	6.79	6.99
现代型	14.51	6.22	7.35	有社会保险(%)	53	37.21	39.43
职业(%)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2611.4	1754.3	1874.4
专业技术和管理	24.12	10.44	12.31	在所居城市居住年限(年)	5.08	4.17	4.29
办事和商业人员	30.03	19.12	20.61	购买住房(%)	22.8	4.55	7.11
服务性工作人员	37.24	43.68	42.8	居住城市层次(%)			
生产工人	7.41	24.25	21.95	省级	85.99	71.08	73
无固定职业	1.2	2.51	2.33	地级	13.66	26.14	24.39
				县级	0.35	2.78	2.44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计生委 2010 年下半年农民工监测数据（B 卷）计算得到。

第一，家庭与人口学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与家庭结构。已有的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何军，2011；何军，2012）。根据农民工的年龄，我们也将农民工区分为新生代和老一代：1980 年前出生的为老一代，此后出生的为新一代。全部流动人口中新生代的比重为 45.44%，农民工中新生代所占比重为 45.07%，城镇流动人口中新生代所占比重为 47.69%。

家庭结构的变量，从社会融入的角度，我们将家庭结构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未婚单身的农民工；第二类是已婚，但配偶未在身边，在所居城市仍单身居住者；第三类是已婚且与配偶在同一城市共同生活者。已婚者以及与配偶共同居住者，由于他们的家庭结构比较稳定，对所居城市的认同度和融入程度可能比较高。

第二组变量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变量。我们使用教育水平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理论上推断，教育水平较高者对城市的认同度和融入程度较高。此处将教育水平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小学及以下，第二类为初中，第三类为高中/中专，第四类为大专及以上学历。

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 (Coleman, 1988; Coleman, 1990), 属于个人能够使用的社会关系性资本。在有关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研究中, 社会资本通常被区分为个体层面的社会网络关系 (关系型社会资本) 和个体从制度中可以获得的资源 (契约型社会资本) (刘传江、周玲, 2004), 或以老乡交往为代表的同质性社会资本以及与城市居民进行经常性互动而建立起来的新型异质社会资本 (童雪敏等, 2012)。在本文中, 我们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体可以使用的社会网络半径。“可用的”是指在现实生活中对个人实现某一目标发生实际作用, “社会网络半径”是指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所能触及的边界。

根据这一定义, 我们使用被调查者寻找工作的途径作为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 依次分为三类: 一是自己寻找工作, 称之为个体型社会资本; 二是通过熟人、家人、亲戚或同学、同乡寻找工作, 称之为关系型社会资本; 三是通过政府部门、社会中介、网络传媒等找到工作, 称之为现代型社会资本。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以个体型和关系型为主, 特别是关系型社会资本 (49.96%), 是农民工的主要社会资本类型; 而城镇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则以个体型和现代型为主。

第三组变量与就业和收入有关, 包括职业类型、职业发展目标、社会保险和收入状况。我们将职业区分为五类: 第一类为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第二类为办事人员和商业工作人员; 第三类为服务工作人员; 第四类为生产工人; 第五类为无固定职业者。农民工的职业层次低于城镇流动人口, 以服务性工作人员和生产工人为主, 无固定职业者的比重也高于城镇流动人口。

被调查者的职业发展目标也对其社会参与和心理认同产生影响。职业发展目标较为明确的, 其生活态度也比较积极, 有更高的概率参加社区活动, 也有更高的心理认同度。我们将职业发展目标分为五类: 第一类为无明确发展目标者; 第二类为成为业务骨干; 第三类为成为管理人员; 第四类为获取较高收入; 第五类为工作稳定轻松。农民工中不清楚或没有职业发展目标的占到了一半以上; 其次是获取较高收入, 占到 29.03%。城镇流动人口中, 不清楚和没有目标的比例要低一些, 且成为业务骨干和管理人员的比例也要高一些。

从理论上讲, 社会保险为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提供了稳定保障, 因此有社会保险的农民工对所居城市的融入程度较高。我们将农民工拥有下列五项社会保险之一都定义为有社会保险: 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

收入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度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研究发现, 收入对农民工城市融合度的影响在初期和中期有正效应, 而在后期没有显著影响 (孟颖颖、邓大松, 2011)。

此处我们使用农民工在所居城市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的家庭人均收入，来考察收入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第四组变量为与居住相关的变量，包括在所居城市的居住年限、是否购买住房以及所居城市的层次。在所居城市的居住年限较长者对所居城市的熟悉程度相对较高，因此预期对城市融入度有正向影响；而拥有住房则表示农民工在所居城市有了稳定的住所，因此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度有正向影响。所居城市的层次，分为省级（省会及计划单列市）、地级和县级。城市层次不同，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也有差别，从而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产生影响。

四 估计结果及解释

我们首先估计混合样本模型，在自变量中加入户籍一项，以发现在控制其他条件下农民工和城镇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是否有显著差异；其次我们分别估计农民工和城镇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度。表5给出了农民工、城镇流动人口及混合样本城市融入的OLS回归结果，表6给出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①，图2给出了分位数回归部分结果。

表5 农民工、城镇流动人口及全部样本城市融入 OLS 回归结果

	全部样本	农民工	城镇流动人口
男性	-0.0113 *** (0.0029)	-0.0100 *** (0.0031)	-0.0197 ** (0.0088)
新生代	-0.0142 *** (0.0037)	-0.0137 *** (0.0039)	-0.0167 (0.0109)
家庭结构(未婚单身为基准)			
已婚单身	0.0270 *** (0.0052)	0.0271 *** (0.0055)	0.0239 (0.0149)
已婚与配偶同住	0.0266 *** (0.0043)	0.0300 *** (0.0046)	0.0161 (0.0121)
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为基准)			
初中	0.007 (0.0048)	0.0063 (0.0048)	-0.007 (0.0258)

^① 限于篇幅此处仅给出农民工在0.25、0.50和0.75个分位点的回归结果；混合样本和城镇流动人口的分位数回归结果省略。

续表

	全部样本	农民工	城镇流动人口
高中/中专	0.0235 *** (0.0055)	0.0199 *** (0.0056)	0.0235 (0.0257)
大专及以上	0.0114 (0.0074)	0.0222 *** (0.0085)	0.0022 (0.0267)
社会资本(个体型为基准)			
关系型	0.0022 (0.0031)	0.0034 (0.0032)	-0.0092 (0.0096)
现代型	0.0114 * (0.0060)	0.0141 ** (0.0068)	0.0004 (0.0137)
职业(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基准)			
办事人员和商业人员	0.0195 *** (0.0054)	0.0256 *** (0.0060)	-0.0122 (0.0125)
服务性工作人员	0.0336 *** (0.0049)	0.0400 *** (0.0054)	-0.0032 (0.0129)
生产工人	-0.0093 * (0.0055)	-0.0059 (0.0058)	-0.0154 (0.0202)
无固定职业	0.0096 (0.0104)	0.0212 ** (0.0107)	-0.0751 * (0.0407)
职业发展目标(无明确目标为基准)			
成为业务骨干	0.0201 *** (0.0074)	0.0258 *** (0.0085)	0.0078 (0.0162)
成为管理人员	0.0066 (0.0058)	0.0085 (0.0064)	0.0061 (0.0146)
获取较高收入	0.0037 (0.0037)	0.0054 (0.0039)	-0.0036 (0.0119)
工作稳定轻松	0.0068 (0.0058)	0.0097 (0.0062)	-0.0097 (0.0159)
拥有社会保险	0.0356 *** (0.0033)	0.0401 *** (0.0035)	0.0065 (0.0102)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0.0078 *** (0.0027)	-0.0031 (0.0029)	-0.0297 *** (0.0075)
在所居城市居住年限	0.0018 *** (0.0004)	0.0015 *** (0.0004)	0.0038 *** (0.0011)
拥有住房	0.0314 *** (0.0062)	0.0450 *** (0.0076)	0.0135 (0.0118)
所居城市层次(省级城市为基准)			
地级城市	-0.0248 *** (0.0039)	-0.0278 *** (0.0041)	-0.0087 (0.0141)

续表

	全部样本	农民工	城镇流动人口
县级城市	0.0604 *** (0.0113)	0.0612 *** (0.0113)	-0.0287 (0.0695)
农村户籍(农民工)	0.0033 (0.0048)		
截距	0.1854 *** (0.0222)	0.1451 *** (0.0228)	0.4155 *** (0.0638)
观察值个数	7338	6339	999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计生委2010年下半年农民工监测数据（B卷）计算得到。

表6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0.25	0.50	0.75
男性	-0.0016 ** (0.0007)	-0.0140 *** (0.0030)	-0.0143 *** (0.0054)
新生代	-0.0011 (0.0008)	-0.0041 (0.0046)	-0.0204 *** (0.0073)
家庭结构(未婚单身为基准)			
已婚单身	0.0050 *** (0.0019)	0.0181 *** (0.0041)	0.0440 *** (0.0064)
已婚与配偶同住	0.0054 *** (0.0019)	0.0188 *** (0.0045)	0.0470 *** (0.0066)
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为基准)			
初中	0.0001 (0.0009)	-0.0016 (0.0063)	0.0083 (0.0092)
高中/中专	0.0019 (0.0013)	0.0117 * (0.0062)	0.0162 (0.0100)
大专及以上	0.0047 ** (0.0019)	0.0125 * (0.0069)	0.0146 (0.0133)
社会资本(个体型为基准)			
关系型	-0.0008 (0.0009)	0.0026 (0.0034)	0.0077 (0.0060)
现代型	-0.0004 (0.0021)	0.0018 (0.0062)	0.0407 *** (0.0088)
职业(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基准)			
办事人员和商业人员	0.0056 *** (0.0019)	0.0251 *** (0.0082)	0.0492 *** (0.0125)

续表

	0.25	0.50	0.75
服务性工作人员	0.0071 *** (0.0017)	0.0374 *** (0.0056)	0.0687 *** (0.0127)
生产工人	-0.0003 (0.0017)	-0.0060 (0.0063)	-0.0011 (0.0114)
无固定职业	-0.0038 (0.0030)	-0.0028 (0.0125)	0.0310 ** (0.0138)
职业发展目标(无明确目标为基准)			
成为业务骨干	0.0022 (0.0027)	0.0056 (0.0093)	0.0223 (0.0239)
成为管理人员	0.0046 *** (0.0017)	0.0083 (0.0078)	0.0096 (0.0129)
获取较高收入	0.0013 * (0.0007)	0.006 (0.004)	0.0175 ** (0.0074)
工作稳定轻松	-0.0011 (0.0018)	0.0134 * (0.0081)	0.0206 (0.0131)
拥有社会保险	0.0054 *** (0.0015)	0.0249 *** (0.0037)	0.0631 *** (0.0063)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0.0011 * (0.0006)	-0.0032 (0.0024)	-0.0087 (0.0057)
在所居城市居住年限	0.0001 ** (0.0001)	0.0015 *** (0.0005)	0.0017 ** (0.0007)
拥有住房	0.0071 (0.0053)	0.0390 *** (0.0119)	0.0649 *** (0.0154)
所居城市层次(省级城市为基准)			
地级城市	-0.0074 *** (0.0013)	-0.0275 *** 0.0033	-0.0474 *** (0.0065)
县级城市	0.0167 (0.0162)	0.0537 ** (0.0234)	0.0641 *** (0.0228)
截距	0.1006 *** (0.0063)	0.1325 *** (0.0239)	0.2041 *** (0.0433)
观察值个数	6339	6339	6339

注：表中只给出农民工城市融入度第 0.25、0.50 和 0.75 个分位点的回归结果；括号内为标准误，通过 Bootstrap 方法获得；*、**、***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计生委 2010 年下半年农民工监测数据（B 卷）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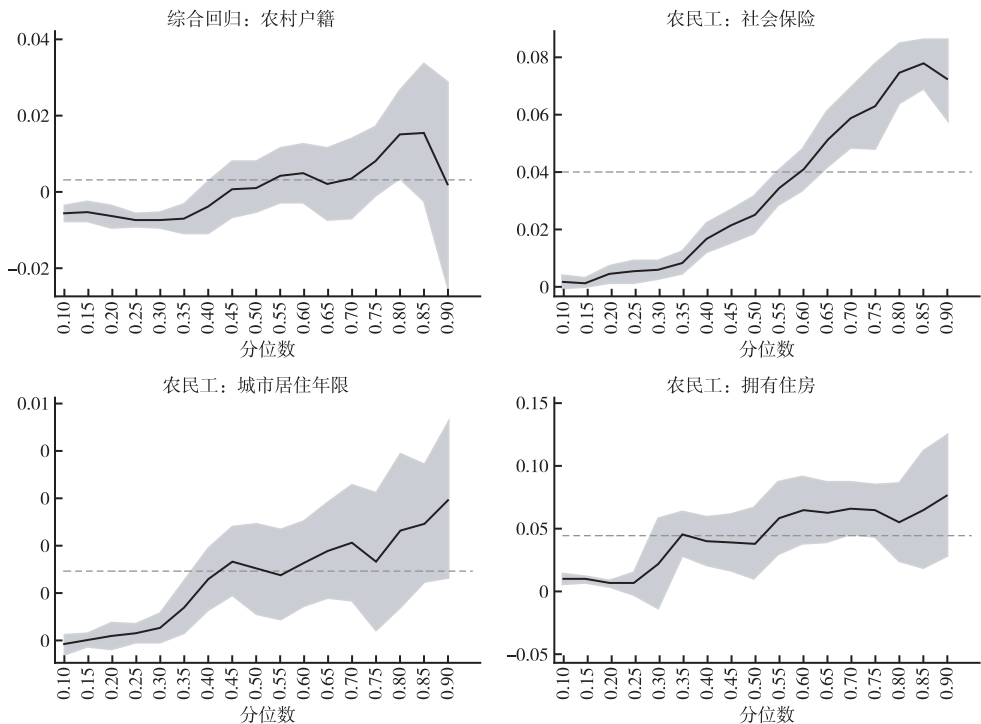


图2 分位数回归部分结果

注：图中虚直线为 OLS 回归结果；实线为分位数回归结果；阴影部分为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计生委 2010 年下半年农民工监测数据（B 卷）计算得到。

（一）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城市融入度在均值意义下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低分位点上（0.40 分位点以下）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显著低于城镇流动人口，而在高分位点上（0.75 分位点以上），农民工城市融入度显著高于城镇流动人口。低端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度低于城镇流动人口，这一点易于理解。而高端农民工社会融入度高于城镇流动人口，所反映的并不是高端农民工拥有比城镇流动人口更良好的融入条件。从实地调查情况看，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融入本地社区对高端城镇流动人口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他们获得公共服务的渠道也是多元的，很多情况下并不需要通过所居住的社区。

（二）城市社会融入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农民工及城镇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度显著低于女性；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均值意义上，而且也体现在不同分位点上。已婚农民工，特别是已婚且与配偶共同居住的农民工，他们的城市融入度显著高于单身者。从分位数回归结果看，随着分位点的上升，婚姻状况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度的影响也在

上升。

(三)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度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在均值意义上,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显著低于老一代农民工。从分位数回归结果看, 这一差异只在高分位点上显著。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更加熟悉, 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出生、生长在城市, 但他们对城市的融入度却不高。这一点表明,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 他们对城市的疏离感更强, 但是距离农村也更远, 成为城市社会中最为边缘的群体。其背后的原因, 与大部分在城市长大的新生代农民工从小就受到的社会排斥有极大关系。

(四)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而言, 只有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者的城市融入度显著较高。分位数回归的结果则显示, 在城市融入度的低分位点上(0.50分位点以下), 高中以上教育程度才显著。

现代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显著正向效应; 分位数回归的结果则显示, 只有在高分位点现代型社会资本才有显著效应。农民工的个体型和关系型社会资本的拥有对其城市融入没有显著影响。城镇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不论在均值意义上, 还是从分位数回归结果看, 都对城市融入没有显著影响。之所以出现这一结果, 我们认为对于农民工而言, 他们从农村迁移到城市, 拥有现代型社会资本无疑是一个进步, 相比于那些缺乏现代型社会资本的农民工, 拥有现代型社会资本的农民工对现代城市社会以及公共性社会网络更为熟知。而对城镇流动人口而言, 他们对城市生活以及城市现代公共社会网络本就熟知, 也就表现不出对城市融入的差异性影响。

(五) 职业与收入变量。从职业角度, 办事人员、商业人员和从事服务性工作的农民工, 他们的城市融入度显著高于其他职业的农民工, 也显著高于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而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城市融入度是较低的, 甚至低于无固定职业者。职业的这一效应还随着城市融入度的提高而提高。这一点不仅在均值意义上是显著的, 而且在不同分位点回归中也是显著的。城镇流动人口的职业对城市融入度则没有显著影响。对于这一结果, 一个解释是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属于高层职业, 他们对单位的依赖程度较大, 对单位活动的参与及心理认同度高, 从而降低了他们对社区参与和对所居城市的心理认同。

职业发展目标也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有影响。从均值意义上, 相比于没有明确发展目标者, 目标为业务骨干的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较高。但是, 从分位数回归结果看, 这一效应随着城市融入度的升高变得不显著了; 而获取较高收入的目标则随着城市融入度的升高而变得显著。也就是说, 成为业务骨干对低端农民工的城

市融入程度有显著影响，而获取高收入的目标则对高端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有显著影响。

(六) 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随着城市融入度的提高，这一效应也随之增大。但是，社会保险对城镇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没有显著影响。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农民工在农村或没有社会保险，或农村的社会保险水平过低，这使得农民工一旦拥有所居城市的社会保险，他们对在城市的未来就有了较强的安全感；与之相反，城镇流动人口在迁出地比较容易获得社会保险，因此在所居城市的社会保险对他们的城市融入度的影响不大。

(七) 与居住地相关的变量。在所居城市的居住年限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这一效应随着城市融入度的提高而逐渐增大。在所居城市的居住时间也对城镇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也随城市融入度的提升而增大。

拥有住房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正向效应，且这一效应随着城市融入度的提高而逐渐增大；但是拥有住房对城镇流动人口对所居城市的融入度却没有显著影响。城镇流动人口在迁出地城镇所拥有的住房可能是导致这一结果差异的原因。相反，对农民工而言，在城市拥有住房意味着他们可以在城市定居下来，从而对所居城市有较高的融入度。

所居城市的层次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影响，相比于省级城市，在地级市的城市融入度显著较低，而在县级城市的融入度显著较高，而且随着融入度的提高，这一效应也随之增大。这一结果表明对农民工而言，融入度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状态，即在大城市和小城市的融入度较高，而在地级的中等城市的融入度较低。省级大城市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管理水平，以及县级小城市较低的生活成本可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

五 结论及政策含义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其市民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能否融入城市是判断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指标。本文使用国家计生委 2010 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构造农民工城市融入指标，分别使用 OLS 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诸因素，并与城镇流动人口进行了比较。在构造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综合性指标上，本文将表示客观活动维度的社区活动参与和表示主观认同的心理认同度结合在一起，借鉴模糊集方法，构造了一个城市融入指标。

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低端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度显著低于城镇流动人口,而在高端则显著高于城镇流动人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显著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在教育水平上,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较高;拥有现代型社会资本的农民工,城市融入度较高。但是,教育程度和社会资本状况对城镇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度没有显著影响。职业与职业发展目标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影响,但对城镇流动人口却没有显著影响。

社会保险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一正向影响随着城市融入度的提高而增大。但是,社会保险对城镇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却没有显著影响。在所居城市的居住年限以及拥有住房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一正向效应随融入程度提高而逐渐增大。对城镇流动人口而言,在所居城市的居住年限对其城市融入有正向影响,但是否拥有住房则没有显著影响。从所居城市的层次看,农民工城市融入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状态,即在省级大城市和县级小城市的融入度较高,而在地级中等城市的融入度较低。城市层次对城镇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没有显著影响。

这些结论对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以及有序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都具有政策含义。首先,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值得关注。我们的分析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显著低于老一代,且随着融入程度的提高,这一差异越来越明显。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他们大多数生长在城市,与农村的联系已经非常微弱;但是,他们对所居城市的社区参与和心理认同度却较低。这使得他们成为一个“孤悬”的群体:既不能回到农村,也很难融入城市,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开始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从政策上,这也给尽快改革户籍制度,给予农民工市民身份带来了紧迫性。

其次,社会保险对推动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为了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应尽快推动社会保障对农民工的全覆盖。

再次,城市住房政策,尤其是保障房建设应将农民工纳入进来。不同于城镇流动人口,在城镇拥有住房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当前的保障房建设政策框架中虽然将农民工也考虑进来,但是各地都缺乏具有操作性的措施。实际上,农民工的住房保障仍处于空白。

最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也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虽然教育水平不可能在短期内提高,但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可以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而且也可以增加他们的社会资本质量。

参考文献：

- 蔡禾、曹志刚（2009），《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来自珠三角的实证分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148-158页。
- 辜胜阻、易善策、郑凌云（2006），《基于农民工特征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人口研究》第5期，第1-8页。
-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编（2011），《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 何军（2011），《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中国农村经济》第6期，第15-25页。
- 何军（2012），《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第1期，第52-59页。
- 李培林、田丰（2012），《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社会》第5期，第1-24页。
- 刘传江、周玲（2004），《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人口研究》第5期，第12-18页。
- 孟颖颖、邓大松（2011），《农民工城市融合中的‘收入悖论’——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第74-82页。
- 童雪敏、晋洪涛、史清华（2012），《农民工城市融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研究》，《经济经纬》第5期，第33-37页。
- 王春光（2006），《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第107-122页。
- 杨菊华（2009），《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人口研究》第1期，第17-30页。
- 悦中山、李树茁、靳小怡、费尔德曼（2011），《从‘先赋’到‘后致’：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社会》第6期，第130-152页。
- 悦中山、李树茁、费尔德曼（2012），《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概念建构与实证分析》，《当代经济科学》第1期，第1-12页。
-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编（2010），《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

化战略》，北京：人民出版社。

- Alba, Richard & Victor Nee (1997). Rethinking Assimilation Theory for a New Era of Im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1(4), 826 – 874.
- Berger-Schmitt, Regina(2000). Social Cohesion as an Aspect of the Quality of Societies: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EuReporting Working Paper*, No. 14.
- Bollen, Kenneth, & Rick Hoyle(1990). Perceived Cohesion: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Examination. *Social Forces*, 69(2), 479 – 504.
- Cerioni, Andrea & Sergio Zani(1990). A Fuzzy Approach to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 In Camilo Dagum and Michele Zenga(ed.), *Income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Poverty*. Berlin: Springer Verlag, pp. 271 – 284.
- Cheli, Bruno & Achille Lemmi(1995). A ‘Totally’ Fuzzy and Relative Approach to the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Poverty. *Economic Notes*, 24(1), 115 – 133.
- Cheli, Bruno(1995). Totally Fuzzy and Relative Measures of Poverty in Dynamic Context—an Application to the 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 1991 – 1992. *Metron*, 53(3 – 3), 183 – 205.
- Coleman, James(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95 – 120.
- Coleman, James(1990).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ubois, Dider & Henri Prade(1980). *Fuzzy Sets and System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Gordon, Milton(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oenker, Roger & Gilbert Bassett (1978). Regression Quantiles. *Econometrica*, 46(1), 33 – 50.
- Koenker, Roger & Kevin Hallock (2001). Quantile Reg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5(4), 143 – 156.
- Lelli, Sara(2001). Factor Analysis vs Fuzzy Sets Theory: Assessing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echniques on Sen’s Functioning Approach. Discussions Paper Series, No. 01. 21,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 Miceli, David (1998). Measuring Poverty Using Fuzzy Sets. Discussion Paper, No. 38, National Centr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Modelling, Faculty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anberra.

Spoonley, Paul & Robin Peace(2005). Social Cohesion: a Policy and Indicator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Immigrant and Host Outcomes. *Social Policy Journal of New Zealand*, 24, 85 – 110.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UNRISD) (1994). Social Integration: Approaches and Issues. UNRISD Briefing Paper, No. 1, World Summ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Zadeh, Lotfi(1965). Fuzzy Sets.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8, 338 – 353.

Measuring and Estimating Urban Social Integra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with Comparison to Urban-Urban Migrants

Wang Zhe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Based on 2010 National Migrants Monitoring Survey Data, the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n indicator measuring the urban social integra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and to estimate factors affecting it with comparison to urban-urban migra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rural-urban migrants at lower end have much lower integration degree than urban-urban migrants; however, these at higher end have higher integration degree than urban-urban migrants. The new genera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has lower integration than old generation. These rural-urban migrants with couples living together and with more education and modern social capital have higher integration level. Social insurance coverage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rural-urban migrants' urban social integration. Rural-urban migrants living in provincial cities and county level cities have higher urban social integration than those living in prefectural cities.

Keywords: rural-urban migrants, urban-urban migrants, urban social integr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O15, R23, Z13

(责任编辑: 周晓光)